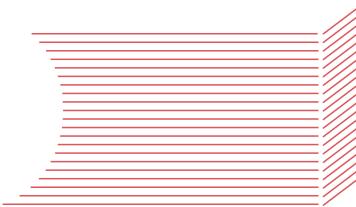


东南亚华侨在抗战中的历史贡献、 内在逻辑与当代启示

——以泉州籍华侨为例

■ 郑丽云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海外华侨约 800 万人，其中 300 万左右为福建华侨”^[1]，95% 以上分布在东南亚一带^[2]。东南亚泉州籍华侨占当时福建华侨总数的 60%^[3]，人数最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最大。民族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东南亚各国的泉州籍华侨与祖国同胞休戚与共，不遗余力支援祖国抗战，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华侨领袖和抗战群体，其领导参与的抗日救亡运动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抗战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

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4]在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东南亚泉州籍华侨的抗战最为突出，呈现出华侨领袖多、救亡组织多、经济支援大、抗战参与面广等特点，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率侨救国：振臂疾呼组建救亡抗战团体

“在华侨人口最为集中的东南亚，救亡运动的规模最大。”^[5]国难当头之际，怀着“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的赤子之心，以东南亚“橡胶大王”陈嘉庚、菲律宾“木材大王”李清泉等为代表的泉州籍华侨领袖挺身而出，领导组建了一大批当时规模最大、动员能力最强、影响力最为深远

的海外救国团体。

在东南亚重要的商埠新加坡，早在 1928 年日本在山东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后，时为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区）人的陈嘉庚就组织召开全侨大会，发起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开创了筹赈会统一领导华侨各帮各界筹赈活动的先河；被称为星马华侨抗日“四君子”的王宣化、粘文华、辜俊英、苏棠影均是泉州籍华侨，他们领导组建的马来西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人数多达几十万人。1931 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泉州籍华侨重要的侨居地菲律宾先后成立 143 个绝大多数由泉州籍华侨担任主要领导人的抗日救亡团体，其中菲律宾华侨社会的核心领袖李清泉所

组建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影响力最大。时任越南华侨总会主席的泉州籍华侨颜子俊，发起组建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赈济总会、越南抗日救国航空委员会等十几个华侨抗日团体。泉州籍侨领创办和领导的华侨抗战团体把“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作为宗旨并为之不懈努力，有力领导发动了东南亚各国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众多的华侨抗日救国团体中，规模、影响和贡献最大的当属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泉州籍侨领李清泉首倡推动下，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南侨总会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以无可争议的威望担任主席，李清泉和漳州籍侨领庄西言任副主席，16位常务委员中有7位是泉州籍华侨，执行委员中则有11位。南侨总会是东南亚华侨第一次超越地域、政党、阶层和帮派组建的抗日救国组织。在泉州籍侨领的组织发动之下，东南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和大统一。

（二）输财救国：毁家纾难捐输巨额抗战物资

战争的本质是国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经济作为战争的基础，不仅决定着国家的军事实力，还为

军队作战提供全面的物质支撑。抗战时期，东南亚各阶层的泉州籍华侨毁家纾难，倾囊捐款捐物，积极发展战时经济，大规模抵制日货，成为经济支援祖国抗战最突出的群体之一。

捐赠物资，倾其所有支援抗战前线。输财助战是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支援抗战最主要的形式。持续时间长是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捐赠的第一个显著特征。1928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的山东惨祸筹赈会，9个月内发动10万华侨募集134万新元；颜子俊1931年组织越南救国缩食会筹赈资金100万元和飞机10架用以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李承俊发动新加坡、马来亚华侨在8个月捐款100万元；陈嘉庚还带头月捐2000元国币，直到抗战胜利。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捐款数额多。南侨总会发出宣言“前方的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刍粟一日不能停”^[6]，仅1938年和1939年就募资1.4亿多元，占同期海外华侨捐款总数的70%；李清泉带头捐飞机1架、领导菲律宾华侨筹购飞机15架，后又认购公债40万元，弥留之际还将遗产中的10万美元捐献祖国，被誉为“临终不忘抗日救国之人”，他领导下的菲律宾援助抗敌委员会仅1938至1940年间就筹赈抗日经费菲币1200万，陈嘉庚称赞“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之冠”。第三个显著特征

是捐赠和参与范围广。李清泉的夫人、泉州籍华侨颜敕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单筹募捐款一项就有132万国币，先后紧急缝制了10万个救伤袋送交前线医院。在缅甸，泉州籍侨胞将温陵、安溪、惠安等会馆变卖用于购买救国公债，还为南侨机工捐献汽车100多辆以及大批衣物和药品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南亚华侨捐款的80%都是贫苦华侨的血汗，他们打出“节食救国”的口号，通过认领日捐和月捐等方式，把历年胼手胝足、省吃俭用的积蓄寄回祖国。整个抗战期间，各地侨胞捐款汇款总额达50多亿元，其中东南亚华侨占总数三分之二，居世界五大洲之首。

投资国内，不计利润稳定战时后方。七七事变后，东南亚华侨纷纷投资国内尤其是西南大后方的工矿、垦殖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投资往往成本大见效慢，加之日军封锁轰炸，不仅盈利艰难，还面临被炸毁血本无归的风险。但陈嘉庚、侯西反等有影响力的泉州籍侨领仍不遗余力地宣传鼓励华侨回国投资，陈嘉庚说：“我们如果终日只知赚钱，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是做奴隶，做亡国奴，发了财有什么用。”侯西反号召华侨“将经营事业以外的余资尽量地拿回祖国投资”。1941年，陈嘉庚和侯西反等人将原计划投建

新加坡的制药厂移至国内，在重庆合资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式提炼药厂，可生产 91 种军需药品，为解决前线士兵药品紧缺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华侨在爱国心驱使下创办的大批侨资企业，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战争和国内民生物资紧缺的状况，当时国内报纸称“在战时的今天，华侨投资当是抗战建国的柱石”。

抵制日货，勠力同心打击日寇经济。“今日买日货，无异供敌人残杀同胞之子弹。”爱国华侨们深刻认识到，抗战时期同日本的商贸往来已超越商业范畴，演变为关乎民族存亡的国家利益博弈。九一八事变后，东南亚泉州籍华侨迅速掀起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宣传要抗日救国就要坚决抵制日货。及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场运动更是达到空前规模，激发了广大东南亚华侨的爱国抗日热情。在菲律宾，侨领李清泉领导成立了专门的抵制委员会，把抵制日货作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实力的重要手段，仅第一年就令日本对菲出口减少 20%。在马来亚，泉州籍侨领导救亡团体发起“拒绝买卖日本货物”“不在日资工厂上班”等救国连锁运动，组织锄奸团巡检，发现日本货物即刻查封，使日商从战前几乎占领全马市场，变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门庭冷落，甚至破产。轰轰烈

烈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总额减少约 39%，给日本战时经济以沉重打击。

泉州籍华侨作为抗战时期输财救国最多的群体之一，与整个东南亚华侨筹赈的物资，在补充抗战军费消耗、支撑战时经济运转、打击日本战时经济等方面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舆论救国：奔走号援团结一切抗战力量

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对于国家来说，没有团结的爱国是无效的，没有爱国的团结是空洞的。泉州籍爱国华侨创办进步报刊，组织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极力促成和维护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为祖国抗战胜利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创办南洋侨界进步报刊。东南亚泉州籍华侨非常重视舆论办报，他们以报刊为阵地，“唤醒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广泛发动和壮大爱国华侨抗战力量。以新加坡和菲律宾为例，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将 1924 年创办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从午报改为早报，邀请胡愈之担任编辑主任，聘请有“华侨革命党第一笔”之誉的泉州籍侨领李铁民为督印并主管编辑部，第一时间向马来亚读者报道中国战况，一跃成为“南洋侨报之首”。在菲律宾，李清泉创办的《华侨商报》和《新闻

日报》成为菲律宾首都、最大港口城市马尼拉最有声望的两份中文报纸。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前，许多进步华侨报刊就已被取缔。中国共产党党员、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主席、泉州籍侨领许立创办的抗日地下报纸《华侨导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及时传递抗战信息，被誉为“华侨抗日民主的旗帜”。泉州籍菲律宾归国抗日战士王纯流回忆说：“1942 年底，我开始阅读地下油印小报《华侨导报》，这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同时也坚定了我的抗日决心。”华侨进步报刊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此外，还有许多泉州籍华侨创办英文报刊、出版以英文为主的国际宣传手册，广泛动员侨居国舆论和国际友人支持抗日进步力量。这些进步报刊，打破了日寇的舆论封锁，是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重要舆论武器。

组织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为促进爱国华侨的民族觉醒，使救国运动变成广大华侨的群众运动，东南亚泉州籍华侨以团结抗日为中心，通过组织抗日游行、发动日企工人罢工、公开演讲、话剧演出、散发传单等方式，最大限度唤起海外华侨的觉醒和团结。以组织日企工人罢工为例，1938 年 2 月，马来亚泉州籍侨领林谋盛组织发动近 3000 位龙运铁矿工人罢工，迫使日本在马来亚

规模最大的军火原料铁矿连带日本军火工厂一同停产，给日本军火制造以沉重打击。在龙运铁矿工人罢工的鼓舞下，同年底，马来亚柔佛州峇都巴辖和丁加奴州甘马挽两地日资铁矿数千名华工义愤自发组织罢工后转为停工，让铁矿生产陷于瘫痪。处于社会底层的爱国华工牺牲生计的罢工运动，打击了日本的军火供应，为国内抗战争取到一定的战略缓冲。

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海外侨胞在宣传抗战到底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国内团结，竭力反对妥协投降和内战分裂。特别是 1935 年华北事变后，他们热切呼吁国内团结抗战，并在国际舆论上不断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陈嘉庚在 1938 年针对汪精卫的投降论调，提出“敌未出土前，言和即汉奸”著名提案，有力震慑了投降派。泉州籍华侨还通过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代表团等活动，冒着战火实地考察国内抗战情况。这些考察活动中，又以陈嘉庚 1940 年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之行影响最为深远重大。在重庆，陈嘉庚对国民党当局的奢侈浪费深感失望。辗转到延安后，他目睹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廉洁奉公、军民团结的景象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有力促进了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了解和认同。

东南亚泉州籍华侨为促进国共合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南亚泉州籍华侨的舆论斗争本质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战场的战略延伸。他们通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及时披露国内抗战实况，凝聚海外华侨抗战力量及国际反法西斯共识，为祖国抗战构筑了至关重要的道义支撑。

（四）舍身救国：共赴国难投身海内外抗战前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艰苦卓绝的战争。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殊死战争中，泉州籍爱国华侨慷慨赴难，放弃原本安稳甚至富裕的生活，毅然投身海内外抗战前线，铸就海外赤子抗击侵略的血肉长城。“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历，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归国参军参战。东南亚泉州籍华侨以身许国，冲破重重阻碍归国参战。他们有的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比如 1937 年 9 月，菲律宾泉州籍华侨许立和沈尔七组织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全队 28 人，其中泉籍华侨 21 人）回国加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一年多后，沈尔七再次赴菲组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全团 24 人中泉州籍华侨就占了 20 位，他们大多数参加新四军直奔抗日前线；泉州籍华侨王雨亭参与介绍了 200

多位菲律宾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他们还有投身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浴血拼杀，如响应“航空救国”号召加入当时死亡率最高的军种空军的印尼华侨梁添成，菲律宾华侨刘灵韶、刘领赐，以及马来亚华侨肖德清等。有的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如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的陈青山等。这些东南亚泉州籍归侨抗战将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打通滇缅公路。随着 1938 年底广州的失守，我国沿海口岸和对外交通要道全部沦陷，滇缅公路成为战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但短时间开辟的滇缅公路是一条修建在高山深谷间的简易土公路，国内技术娴熟的驾驶员和修车机工极度匮乏。为保障这条“抗战输血线”畅通，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迅速发动招募了 9 批共 3200 多名东南亚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其中有 600 多人原籍泉州。他们之中有第一批“八十几先锋队”总领队、新加坡华侨白清泉，第三批总领队、马来亚华侨刘贝锦，负责组织联络南侨机工并解决其生活医疗问题的新加坡“机工保姆”侯西反，以及瞒着家人辞去学校教员工作、化名“施夏圭”报名的马来亚富家女白雪娇等。这些归侨赤子为了祖国将个人生死置之外，在敌机空袭频繁的情

况下，驾车奔驰在长达 1100 公里的滇缅公路及粤、桂、黔、滇、川、鄂各地，风餐露宿、前赴后继地抢运军用物资，以三分之一血洒公路、牺牲生命的代价，捍卫了祖国抗战的军运大动脉。据记载，至 1942 年 7 月，滇缅公路运输的军需品和其他物资就达 45.2 万吨。

参加海外战场。除了归国参战，许多泉州籍华侨还积极参与侨居国的抗日斗争，与当地民众并肩作战。比如新加坡泉州籍华侨林谋盛担任中英联合军团东南亚华人地下抗日军马亚来华人区区长，潜入马来亚开展敌后情报工作，后不幸被捕牺牲。林谋盛的英勇事迹被新加坡学校写进教材，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他的名字命名道路，林谋盛纪念塔是新加坡唯一一座纪念二战个人英雄的纪念塔。再比如骁勇善战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简称“华支”），大部分将领和战士都是泉州籍华侨，总队长是泉州石狮的王汉杰，副队长和 2 位参谋长以及 5 个大队中的 3 位大队长、1 位参谋长、4 位指导员都是泉州籍。从成立到日寇投降，“华支”在 3 年间转战菲律宾各省，参与大小战斗 260 多次。一位美军军官在庆祝大会上说“如果没有华支的配合，美军就要多花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占领马尼拉，而且要付出更大的代价”^[7]。东南亚华侨的抗日

斗争有力配合了国内战场和东南亚盟军战场上的作战和大反攻。

从敌后战场到正面战场，从物资运输到正面杀敌，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国内战场，还是在异国他乡的战斗中，泉州籍爱国华侨们都以无畏的勇气、坚定的信念投身海内外抗战前线，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捍卫民族尊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二、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抗战的内在逻辑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的伟大斗争。作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之一，泉州籍华侨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援祖国抗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至关重要的贡献。从个体家国情怀的觉醒迸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引领，再到民族精神的集体共鸣，三者共同构成了泉州籍华侨投身抗战的内在逻辑。

（一）爱国爱乡的朴素家国情怀是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抗战的直接动因。泉州地处东南沿海，自唐代起就有不少客商、工匠迁居国外谋生。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欺凌、兵患匪乱频发促使泉州籍华侨以空前规模移居海外，足迹遍及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彼时中国积贫积弱，国际地位低下，东南亚泉州

籍华侨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以宗亲为纽带的抱团互助成为生存之道，而改变“海外孤儿”的艰难境遇和低人一等的屈辱地位则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做人不能受欺负，国家不能受欺负”的朴素爱国爱乡情结由此逐渐形成。这种在苦难中淬炼出的朴素深厚的家国情怀，在抗战时期迸发出强大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如汹涌浪潮般开展起来，“爱国不落人后”成为他们心中共同的信念。菲律宾归侨战士王纯流被国民党兵盘问打起仗来为何不回南洋时，他掷地有声地回答道：“自从九一八日本强占东三省，外国人瞧不起中国，华侨在海外很受气。有血性的中国人，谁愿意当亡国奴？我回祖国就是为了打日本，怎能跑回去当逃兵？”皖南事变后牺牲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的答案是：“既然咱的祖国这样穷，这样弱，凡是有志气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她争气立志，振兴崛起。”这些诚挚的话语是无数东南亚泉州籍华侨爱国爱乡的生动写照，深刻揭示了海外赤子在国家危亡之际毅然投身抗战洪流的直接动因。

（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抗战的核心旗帜。历史的进程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旗帜，是引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伟大旗帜，也是引领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投身抗战的核心旗帜。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屡遭挫败的根源在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的软弱涣散。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历史使命。九一八事变后，党率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和发展全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理念跨越重洋，通过东南亚的党组织、进步报刊、华侨社团等渠道广泛传播，在东南亚华侨群体中引发强烈共鸣。从倡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到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英勇作战；从《论持久战》坚定抗战信心，到组织引领华侨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理论、坚定的民族立场和卓越的领导能力，让海外华侨看到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领袖直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不仅是东南亚泉州籍华侨在历史比较中得出的必然论断，更是中国共产党以中流砥柱之姿团结引领海外侨胞共同抗战的时代注脚。

（三）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特质是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抗战的力量源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是一部

血与火的战争史，更是一部民族精神的熔铸史。这种精神特质在东南亚泉州籍华侨身上，体现为跨越山海的血脉联结和共赴国难的使命担当。当抗战的烽火燃起，他们将宗亲抱团的生存智慧转变成强烈的民族团结共识。南侨总会成立大会宣言中写道：“惟精诚始足以言团结，惟团结始足以言力量。精诚充，则团结未有不固；团结固，则力量未有不宏。愿我八百万同胞自今日起，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8]马来亚华侨白雪娇给亲人的诀别信写道：“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使东南亚各国的泉州籍华侨以“侨胞无分地域，救国不分先后”的空前团结，凝聚起众志成城的海外抗战力量。

三、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抗战的当代启示

抗战时期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华侨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运动。东南亚泉州籍华侨与祖国人民同仇敌忾、并肩作战，以率侨救国、输财救国、舆论救国、舍身救国等多种方式，强有力支援祖国抗战的壮举，不仅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民族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雄壮史诗，更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深刻启示。

（一）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团结东南亚乃至全球海外华侨最终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政治保证。抗战时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华侨才得以凝聚起最强大的海外抗战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9]万山磅礴有其峰，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缺乏统一意志与核心引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国家的发展也将陷入失序之境。实践启示我们，新征程上，唯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更加成熟、更加纯洁、更加强大、更加有战斗力，方能汇聚起全国各族人民与海外侨胞的磅礴伟力，万众一心地把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

（二）必须始终坚持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10]。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动

员、依靠和团结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所有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滚滚历史洪流。纵观东南亚泉州籍华侨抗战的历史，无疑是一部海外侨胞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奋斗史，海外华侨社团、进步人士、普通侨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及南侨总会等救国团体的直接发动下，超越地域、阶层和党派界限，共同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秉持团结奋斗的精神，就没有翻不过的山、跨不过的坎。新时代新征程上，唯有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特质，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将海内外中华儿女像石榴籽那样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巨大合力，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 必须始终坚持斗争精神。东南亚泉州籍华侨的抗战历程，是在筚路蓝缕的海外谋生史上迸发出的民族精神光辉，更是一部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在敌我差距极其悬殊的民族浩劫面前，华侨们发挥“敢于拼搏，勇于斗争”的闽南精神，不畏强敌、义无反顾、慷慨赴难。无论是毁家纾难、集腋成裘的后方筹赈捐款，

还是抱着“誓死报国不生还”“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永别”的华侨抗战飞行员，又或是在生命线兼死亡线的滇缅公路上日夜兼程的南侨机工，这些泉州籍海外赤子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既是伟大抗战精神的一部份，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斗争精神，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斗争意识，磨砺斗争本领，在重大风险、重大挑战面前敢于迎难而上，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奋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注释：

[1] 王亚君：《福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1期。

[2]《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3]《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4]《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78页。

[5] 杨子岩：《抗战丰碑上，有个大“侨”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9月5日。

[6][8]《南侨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59、60页。

[7] 吴开胜：《南洋华侨游击队抗战故事》，《环球时报》2005年8月12日。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10] 习近平：《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求是》2025年第13期。

(作者单位系中共泉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